

【思想文化史研究】

清末民初陆军军医学校考述

张建军

【摘要】陆军军医学校是民国中央政府开设的一所重要的军事医学院校,1901年在天津开创,归北洋军医局管理,1907年,陆军部接管并颇有建树。进入民国后,陆军部着力推进该校师资及其深造机制、医药人材分科递进培养机制的建设。该校招生政策虽然时有调整,但整体稳定。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比较严格,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1915年该校附属医院的设置,极大地方便了学校师生的医学实践,为其扩展社会服务创造了条件,也为日后各种军事医学机构服务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模板。20年代初,陆军军医学校因办学经费紧缺而走向没落,尽管遭遇政权更迭,仍在新时代中得以延续。这也是民初许多教育机构在时代转折中难以幸免的痛苦经历。缕清清末民初陆军军医学校的曲折发展历程,对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北洋军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军事医学;军事教育

【作者简介】张建军,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副馆长(呼和浩特 010022)。

【原文出处】《军事历史研究》(京),2020.2.23~44

近代以来,日渐强盛的西风将西洋医学吹入中国军界。民国北京政府陆军部所办陆军军医学校是中央政府开设的一所重要的军事医学院校,是清末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续办,更是晚清以来西洋医学在中华传播的结果。1949年以前,关于该校的各种看法,存在诸多模糊和讹误之处。^①1980年代,一些医学史的通论性著作对陆军军医学校时有提及。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该校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该校的史实廓清作出了较大贡献,^②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是研究尚不够完整细化、结论多有彼此矛盾乃至明显背离史实之处。早在1928年冬,该校毕业生吴羽白即指出,“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国内各专门医学学校里,要算资格最老的、历史最长的一个。先后毕业人员,不下千余人”。^③可以说,这一教育机构,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医学教育史领域还是军事教育史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笔者拟将这所陆军军

医学校置于当时政局中进行考察,还原其真实面貌,以期推进中国近代军事医学教育史的研究。

一、清末北洋军医学堂在天津初设

1901年,袁世凯奉命在天津编练北洋常备陆军,同时设立北洋军医局和陆军医院。“斯时医才缺乏,中医居大多数,间有一二专门医员,悉非军医出身”,这与新式陆军对医疗救护人材的需求相差较远,也“于军队卫生之计划尚未讲求”。袁世凯认为,“东西各国,崇尚教育,医计器械皆设专科,以专科之学问,定军佐之职司,是以士饱马腾,虽裹创鼻伤而愈奋”,特于次年9月,请准在天津设立行营军医学堂,“以为养成军医人材之所”,并拨给水师营地基,作为建造军医学堂的基础,“徒以建造需时”,学堂暂借天津东门外南斜街浙江海运局房舍,于11月24日开办^④,北洋候补道徐华清(北洋医学堂首期毕业生)为总办,唐文源(北洋医学堂二期生)为监督,聘日本二等军医正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学制4年。^⑤

学堂开办后,袁世凯明显感觉到“海运局地甚狭小”,曾与同在天津的北洋医学堂商量借用一处地方,然对方所能挪让者“又为铁路局办公之地,一时未能腾让,遂议定在三叉河口东关地”另建学堂新址。^⑥此间,学堂一度迁入东关外的陆军医院内,“所有学生以四十名为定额,并陆军各营医生咨送肄习西医,该堂一切事宜系马医学堂监督姜大令(即姜文熙,笔者注)兼理,刻已奉到袁宫保札饬矣,约在六月间即可开办,以便招考学生”^⑦。首期学生中,天津籍尤多,考试科目有国文、日文和英文,“考虑到当时会外文的不多,所以试题很浅。还有变通办法,即不懂外文者,只要国文特别好,也可录取,进校后再补习外文。这样一来,有不少举人、秀才也来考。”招生年龄虽限定为18-25岁,“但有些人瞒了岁数。所以学生中不但有举人、秀才,还有三四十岁的老学生,是一个中西合璧、老少俱全的大杂烩。”^⑧尽管如此,“当时招收的第一、第二期学员多系在同文馆学习过外文的学生”。^⑨

此时,中国社会对于中西医的争论已非一日。学堂特于1903年出台《军医学堂章程》,就推行西医向外界作出解释:“现各省仿照西法练兵,将来军医必不可少,拟延请东西洋著名军医,专教各省军人,学额以各省派来人数为定”,其“学费酌议”。之所以采用西医而非中医,“军医专习西法,行军所需药物以简为要,华医药味太多,不易齐备,不若西医用法捷而备药简也。”“军医以伤科为重,凡跌打损伤等症,中医旧传有妙法验方,亦须学习,以助西法之不足。”^⑩

1904年年底,学堂招新生,“凡考取者,入堂肄业普通医学三年,毕业后,禀由直督派员大考一次,以列入优等学生,派赴东西各国学习专门,由官给费。列入次等者,则发给文凭,派赴各营充当军医。”另外,学堂还从日本中岛裁之开办的京师东文学社录取25名谙熟日文的学生。^⑪

1904年秋,学堂增设解剖学一门,“惟中国风气未开,不敢骤然试验,仅以猪羊等畜代之”,后“由日本教习某君在日本购来人体数具,用药水贮之玻璃

大罇中,以资考验。”^⑫1906年,总教习平贺精次郎“以解剖课程仅系纸上空谈,不若实行经验,特从外洋购来全蜡人型一具,令各学生一一拆卸,复一一安接,以期久久习验,洞悉人身作用”。^⑬

1905年3月,袁世凯为扩充该校学生规模,同时平衡在清末新政中时而出现的满汉矛盾,奏请挑选满、汉学生140名,“分班毕业,分年授课,以储正副军医官、军医长之选”。^⑭1906年4月,学堂新校舍在天津河北四马路黄纬路一带^⑮落成,遂一体迁入。学堂教员多为日人,总教习仍为平贺精次郎,三井、高桥、北山、四杖、我妻、藤田、味刚等日本教习用日文教学,只有中国教习吴为雨1人并用中文教学,学堂与“日本教习都订有合同,对他们是特别优待,平贺月薪350两银子,其他教习也是250两银子”。学堂另附设防疫学堂,由日本教员古城梅溪主持。清廷准袁世凯所请,学堂增招旗籍学生一班,共20多人,又续招第二期学生120名,“冬季招生,春季入学”。“因很多人没学过日文,只好在学生中挑选出几个日文好的,作为‘主听’,教习讲课他得记下来,由国文好的加以整理,再由日本教习看一下,不对的改正(日本教习多懂得中文),再油印分发。刻蜡版、印刷等事,全由学生自己干。那时学生的功课是忙的,还得赶学日文”。^⑯据沙林芳回忆:“第二期学员多为八旗子弟,故又称第二期为旗班。因当时的人多数不愿上洋学堂,故由八旗贵胄中选拔子弟入学。”^⑰

教员既多日人,课堂内外教学训练中,起初多用外洋词汇表述,“殊未合理”。为使学堂教育更具中国风格,使学生浸润爱国之心,袁世凯札饬自1905年起,“一律改从华字口令”。^⑱1906年闰4月,吴为雨调入北京内城官医局为医官。^⑲1907年,新任中文教习张景生“以汉文为国粹,已禀奉该堂总办于课余之暇,每日增讲汉文二点钟,该生等亦皆乐从。”^⑳学堂曾设体操课一门,“嗣因教育未得其人,暂停此课”。总办徐华清禀请袁世凯由陆军部调拨教习1员,于4月3日到堂授课,“并借定河北医院后面隙地作为操场”。^㉑由于学生规模的逐渐扩大,学堂房舍明显不敷使用,遂于1907年夏“在银元局后添建新堂一所”,

扩大办学空间。^②按当时北洋新军军制规定,每镇设20名军医生、20名军医长和6名军医,由于军医人材紧缺,各镇空额很多,袁世凯将此笔薪饷暂充军医学堂经费。^③

1906年2月初,北洋军医学堂头班学生即将毕业,袁世凯“以各镇标军医乏员”,责令徐华清“赶紧加课,务期本年伏假以前毕业,以便拨往各营。”^④春节过后,开学在即,学堂原拟于2月12日开学,因“加授课程,宜早温习,特将日程提前”,甲、乙两班分别于2月2日、9日先后开学。^⑤为使学生有更多发展空间,4月20日,军医学堂选派学生4名,随带药料10余箱,随同新任奉军辽北总统张勋前往奉天行营医院任事^⑥,因系首届毕业生,一时颇受瞩目,奉派“在各营当差,有当副医官的,也有当医长的,他们穿的军衣,都是袖口上嵌着双道金龙跟红十字,副医官带着蓝顶,医长带着水晶顶”。^⑦

北洋军医学堂学生多来自各省保送的旧制中学学生。^⑧1906年春,学堂决定招收新生1班,专门学习牛痘方面的知识,定于4月8日在学堂考试,一年毕业后,即行派赴卫生等局所充当官医。^⑨“此次报名投考者人数颇众”,学堂提高了对于英文考试的要求,“须已学习普通,始能合格”。^⑩本次共取录学习牛痘方面知识的学生30人,其中,通日文者9名、通汉文者25名,复试题目为“防疫政策”,同时测验算学一题。^⑪

学生在学期间的生活待遇比较优厚,“最初是每人每月津贴7两银子,约合10块多大洋,其中3块钱伙食,3块钱杂费(包括文具等),其余为零用钱。服装是一年发单、棉两套军服,可平常很少人穿,都穿自己的便服,遇到参加什么大典才穿军服。但改为陆军军医学堂之后,一切由学堂供给,不再发津贴了。在校内、校外一律都得穿军服,军服跟士兵的一样,只领章上有个‘学’字”。学生须接受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堂在海运局校址时,因日本教习平贺精次郎、我妻都是日军少校军医,学生得此便利,可与附近驻防的日兵一同参加操练。此后,平贺精次郎在学堂左偏隙地建造操场,“四面围以短墙,与本堂

相联一气”,改由直隶总督衙门卫队负责学生的军事训练。^⑫1906年12月,首期学生毕业,正值清廷彰德秋操,为使学生有更多实战机会,平贺精次郎挑选王景元等6名学生,指导组织卫生队,派往河南彰德随营观操并实地练习。^⑬

二、陆军部对北洋军医学堂的接管与建设

起初,北洋军医学堂归北洋军医局管理^⑭,后改归陆军部管辖。关于移归时间,目前有3种说法,一是1906年说。陈邦贤认为,学堂于迁入新校址同年由陆军军医司接收,同时改称陆军军医学堂。1908年,添设药科,学制3年。^⑮二是1907年说,同年添设药科。此说来自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16年影印本。^⑯三是1908年说,此说来自1916年陆军部编印《陆军简明统计报告书》。按其记载,1907年8月,添设药科,一年后,改隶陆军部,定名陆军军医学堂,未几改称陆军军医学堂。^⑰由此可知,关于药科的设立,也有两种说法。据载,“迨至光绪三十四年,以徒有医科不能完满军队卫生业务,复创办药科,仍由徐华清氏主持,聘任日籍教官平和等二人,筹备完成,与医科同隶于教务长之下,修业期定为三年,其教育主旨,在造就军队中之司药专才,所授科目,则于调剂及卫生器材管理之外,兼授以制造与检验之技术,其第一期学生于宣统三年毕业,嗣后年招新生”。^⑱笔者比较倾向1907年说。以往该校的各项规章都出自北洋大臣,而1907年陆军部修订公布《军医学堂试行简章》,其中特别强调,“陆军部奏设之军医学堂现定于九月初六日(即10月12日)开办。”^⑲可见,北洋军医学堂是在1907年改归陆军部办理,同时改称陆军军医学堂,经费转由陆军部开支。

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咨行陆军部称,“军医学堂添招新班六十名,现拟由天津、保定两府中学堂内择优挑送,定于四月十五日取齐,二十一、二等日分期考试”。陆军部认为,军医学堂既已改归陆军部办理,其招考新生,自不应仅限于津、保两地,而应“再在京师各中学堂内择优挑送”。为此,陆军部咨行学部称,“原额六十名,除由津、保两中学堂考选四十名外,其余二十名,拟由贵部飭行京师各中学堂选

定合格学生,并取具甘结、保结及该生等年籍清册,一并如期送“军医学堂参加考试,“并照原咨所拟办法,于应送二十名添送数名,以备甄核”,学部为此转行京师督学局。督学局指出,“军医学堂考期定于四月二十一、二等日,现已逾期,业经由局电商该堂,允为留额候送。除通行京内各学堂按格选齐,由局复考再行送该堂收录外,理合呈请先复陆军部查照”。学部随即咨复陆军部,陆军部咨复北洋大臣袁世凯,袁转行该学堂遵照要求发出招生通知。^④

前述1907年陆军部公布《军医学堂试行简章》,规定:“一、此次考取学生送入医学馆,以备他日拨入军队充当医官、医长,惟现系试办,一切规模尚未齐备,俟再设法扩充。二、医务关系綦重,学生资质不齐,非确有所得,遽令诊视,贻害匪浅,故各生毕业年限不能一律,特限定三年大考一次,如有于医科各学确有把握者,即行给予凭照作为毕业,否则仍令在堂学习。三、毕业之后,由陆军部按其程度分别札送各镇考验合格,即行派差。四、各生入堂一月应举行甄别一次,以定去留。五、各生于甄别之后,月给膏火银三两,季考一年加至四两,二年加至五两,三年加至六两,以资鼓励。六、本馆除备讲堂之外,并无寄宿斋舍,应按所订钟点来堂听讲,课毕即行回寓。七、各生均于每月三、六、九日到堂听讲,风雨不移。八、每日课前或课后由本学预备小餐一次。九、凡该生等所用一切纸笔书籍,均归官备,概不取费。”^⑤学校随即在《由八旗、顺直各学堂调取学生章程》中规定,“此项学生总以品行端谨、在中学堂肄业二三年以上、文理通顺、普通学各有心得,年齿自十八岁至二十二岁,身体强壮不染嗜好者为合格。先由该堂取具志愿证书,造具学籍清册,注明姓名、年籍、出身、入学年分,连同监督、堂长暨学生家属甘结、保结,一并送由提学司汇齐咨送到堂,以凭考试。至各学堂挑选人数,应于定额外加多数名,以便考试时酌定去留,往返川资均由该生等自行筹备。不入选者仍回该本堂肄业”。^⑥优厚的待遇吸引了一些海外留学归来而求职无门者,他们也申请转入该学堂读书。例如,直隶元氏县留日学生张作新希望本

省提学使咨送该学堂学习,批复称,该生应“自行禀报报考”。^⑦

陆军军医学堂注重规章制度的建设,对1903年《军医学堂章程》进行了修订,并在新拟《军医学堂试办章程》中规定,学堂所招学员必须“质敏体健、文理通顺”;学习科目以中、西医学为主:第一年学习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组织学及实习、胎生学、算学、汉文、日文、英文,第二年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及实习、病理学、病理解剖学、诊断学、外科总论、药理学、汉文、日文、绷带学、药方学、内科总论,第三年学习内科学、外科各论、眼科学、产科学、妇科学、婴科学、传染病学、普通卫生学、内外科诊验、汉文、日文、军阵外科学、军阵卫生学,第四年学习内科学、外科总论、眼科学、皮肤病学、耳鼻喉科学、产科实习、细菌学、法医学、精神病学、内外眼妇婴科诊断、军队卫生事务、军事学、汉文、日文、学堂卫生学、工业卫生学。^⑧教科书多采用日本南江书店的日本医书。^⑨

学堂初建时,曾花费白银5万多两向日本购置了一批仪器和图书。该校转归陆军部管辖后,经费增多,又添备X光机等设备。“教学中最困难的是人体解剖,只有打听到枪毙的犯人中没有家人来领尸的,经申请批准后,才能把尸体弄来解剖。军医学堂还专门聘请一个意大利人马鼎尼指导解剖实习。”学堂教学和考试十分严格,“功课跟不上、考试不及格”者多遭淘汰。例如,第二期生入学时120人,经陆续淘汰后,毕业时只剩50人,“毕业考试时又有两人不及格,准其留级一年,下次再考。”这种优胜劣汰机制保证了学员质量。当时,“军医学堂除内科、外科、皮肤科、军阵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及附设之防疫传染科之外,还有妇科和产科。同学中多认为军医用不着妇、产科,学校对此两科亦不大重视,故毕业考试时,对妇科、产科成绩差些,仍可毕业。”^⑩

1908年,伍连德因对医学研究“极有心得,为英美医员所赞赏,声名籍甚”,遂得海、陆军界权贵引荐,受聘为陆军军医学堂帮办。^⑪踌躇满志的伍连德在学堂建设方面付出不少努力。学堂“教授多为日本医界及留日医学名流,采用日文教授,但对于实习

及防病上未加注重”⁸⁸，这是学堂课程建设的缺点。按照伍氏的说法，当时的学堂教育中，“英语并非必修，而着重基础知识。教学时使用日文和中文，资深的日本教授是为上校”，“其他日本教师讲授生物学、化学、药理学、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和外科学。中国老师则专职组织中国文学和日本语教学。学堂内未设解剖室，但是在市医院里可有尸体供观察和解剖，医院中每天诊治的病人可供内外科的实习教学。医学院内只有少数病床可供病例观察，而且绝大部分都属于外科病例，也是由那位资深的日本教授负责。行政部门尽可能不干涉日本人的教学方法，然而其水平并非上乘，学习4年后毕业的学生并没有达到西方国家所要求的标准。”作为帮办的伍连德“不会说日语”，且说中国官话亦有一些困难，于是找到一位中国教师辅导官话，“以应付小医院中门诊和病房中的教学”。在伍氏看来，除一位化学教师外，其他日籍教师“都十分傲慢，金口难开”，仅仅希望中国学生“成为高级护理人员”。⁸⁹

清末朝廷鼓励新学，特于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1906年10月2日，学部奏定《考验游学学生毕业章程折》，拉开海外归国学生报效朝廷、得赏出身的序幕。随着日本教习的聘期渐满，清廷逐渐以归国学生及军医学堂资深毕业生充当教官，“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⁹⁰1908年5月中，因各省新军编练“多未经意于军医一项”，陆军部“拟俟天津军医学堂各班毕业后，即将是堂改为通国军医学堂，其一切组织办法，均仿通国武备学堂办理，惟实行之期，现时尚未决定。”⁹¹又因“学生额数过少，现陆军部飭令推广学额，本定三年毕业，今又加增二年，统计五年毕业”。⁹²但是，改为全国军医学堂的计划，直至两年后仍未提上日程。1910年夏，陆军部旧案重提，希望“将原设之军医学堂扩充改为全国军医学堂，由各省按所练镇数多寡，选送学生入堂肄业，每年招收一班，以五年为毕业”。此间，红十字会也有设立类似医护学堂的打算。军咨处在详核红十字会奏折时指出，红十字会“如欲多造医材，尽可按年分送学生十

人，入堂附课，自不必舍近求远，况以九年之期，而仅成就学生念[廿]人，亦未免播多而获少”⁹³，因此不必另设骈枝机构。

1908年，军医学堂拟继续招生40名。督办陆军各学堂事宜、副都统段祺瑞呈文陆军部称，“请以二班毕业官兵各生伙食银两，留作新班学生伙食”。陆军部指出：“所拟办法尚属合宜，应即照准。挑选学生一节，仍应按照前届，由八旗、顺直各学堂遴选办理。该堂酌定试期，即行呈报本部，以便分别咨札，按格录取，送赴该堂考试。”为此，陆军部要求段祺瑞转知军医学堂答复详情。学堂表示，此次续招新生办法仍与前同，续招新班仍由顺直各中学堂考选20名，京师八旗各学堂考选20名，“务于取齐之前送到，以期无误”。陆军部一面咨行学部转飭京师八旗各学堂按格选送生员，一面咨行直隶总督杨士骧转飭“顺直各中学堂选定合格学生，并取得甘结保结及该生等年籍清册，一并如期送天津军医学堂汇同考试，并照原呈所拟办法，于应送二十名外，添送数名，以备甄别”。⁹⁴因官费学生名额有限，1910年，两广督练公所兵备处咨行陆军军医学堂，希望该堂可以“添招自费新生”，因而当年学堂招生名额明显增多，录取80名。⁹⁵

根据伍连德的观察，1909年前后的陆军军医学堂“有从全国各种高中毕业的学生200余人，年龄在17岁到22岁之间”。“我们的学生有进取心，学习主动而且纯朴，不过基础颇肤浅，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学得更好些，只满足于接受教给他们的知识而从不提出问题”。因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体格和生活习惯差异甚大。例如，来自广东和福建等省的学生，比起那些从北方来的身躯魁梧粗犷的同学来，便显得身材矮小却头脑灵活。一般来说，大体上长江以南(包括浙江和云南)的学生以大米为主食，也进食比北方年轻人更多的猪肉或其他肉食，而北方人更习惯小麦、小米和生吃大葱。不过在需要身体耐力的体育运动和竞技时，北方人通常要胜过南方人，而在考试和绝大多数室内比赛中，南方人则要略胜一筹。”⁹⁶

1909年,陆军部考虑到朝廷已定由学堂总办徐华清充任赴俄专使戴鸿慈的随员,而此时陆军军医学堂的人事权还未彻底交付陆军部掌管,特咨请直隶总督杨士骧札委伍连德暂行代理学堂总办职务。^⑤

早在1908年3月中,陆军部即上奏朝廷,“军医各学堂毕业生系属军佐,自应仍照陆军毕业生章程比拟办理。凡考列上等者,准补同副军校,上等者,准补同协军校,业经奉旨允准钦遵办理在案”。1909年,军谘处奏定“军佐各官均就所习科目,标以专门之名称”。同年4月前后,军医学堂第三班举行毕业考试,陆军部派员到堂监考,“将各门课程以研究医理者为学科练习医,医法者为术科,按科严密考试,核定分数,分发陆军各镇试充军职,嗣见习期满,据各镇统制官将试充军职期满各生分数列表申送到部”,复由陆军部“参以前考分数平均计算,分定等第,按名发给文凭”。1910年6月初,学堂第三班毕业见习期满,陆军部请准为其核定等第、补授以军医副、协军校官阶。从所列名单及其等级可知,有学生18名被列为优秀,30名被列为中等,另有1人未能毕业。^⑥这种入伍候差的分配办法“也很特别,叫做抽签。在陆军部大堂上摆有两个签筒,一个签筒的签写着部队名称和驻地,另一个签筒的签则写着每个毕业学生的名字。毕业学生都集合在大堂,当众抽签,两个签筒同时各抓一个签出来,以决定什么人到什么部队去候差。到队任职一年后补官,补官后由镇加考语,表现好的才转正。”“先毕业的,因当时军医少,一补官就是上尉军医。后来学生多了,一般都是中尉军医。第一期毕业成绩特别优异的,还可当少校”。^⑦

三、民国初期陆军军医学堂的制度建设

共和告成,1912年7月,陆军军医学堂改称陆军军医学校,仍直隶于陆军部,“内部一切悉仍旧”。^⑧执掌学校10年之久的徐华清不肯为民国效力,提出辞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本校医科第一期生李学瀛继任校长,王官、戴棣龄(1913年2月18日上任)先后任教务长。^⑨清末陆军军医学堂的各种规章制度,至民国初期已多不适用,需要重新厘定。为此军

医学校在师资建设和深造,医药两科人材的分科递进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一) 师资及其深造机制

1912年夏,陆军部军医司拟定《陆军军医学校条例》(共27条)和《陆军军医学校教育纲领》(共16条,以下简称《教育纲领》)。陆军总长“逐条审核”后,认为该司所拟“尚属周妥”。当时西方各国的陆军军医学校,是在普通国民教育发展到相当程度后推行的,故无需在专门学校内继续开设普通课程。民初陆军军医学校课程设置虽然在整体设计上仿效西方国家军事教育制度,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天不足,决定该校必须“补课”。陆军部对此颇能自省:“我国医学尚未发达,不能不变通办理,酌设普通科,以期切于事实。”9月9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认为陆军部“所拟尚属妥协”,允准该部将两项规章正式颁行。^⑩

按照《陆军军医学校条例》规定,该校以“养成军医、司药各等人才、编辑教科书及实行军事卫生试验之所”为宗旨。学校所设职员及其职掌如下:校长1人(军医监、一等军医正)总理校务,并监督各职员;教务长1人(一二等军医正)“为教官之领袖,保持教育之统一”,另有教官(二、三等军医正及司药正)、助教若干人(一二等军医、司药及上中尉或文官),负责各项教学任务;学生监1人(二三等军医正)“实施军事训育,监视学生之军纪、风纪,并稽核学生之勤惰”。副官2人(一二等军医、司药及上中尉)、军需1人(一二等军需),分别承校长之命,掌管图书、文牍庶务及会计事务。学校还可根据实际需要,雇佣助手、书记等员,助理各项事务,缮写讲义录和其他文件。所有教职员由陆军部荐委。^⑪陆军军医学校在这套管理体制下运转起来。为保证教学管理的专业性,每位职员都需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资格。

1913年夏,学校因在册学生多达310名,添委学生监一职,同时将全校学生分编为3个连,分设连长1员,“订拟校内各项规则”。1914年,开辟药科药用植物园,以增补学生普通医药学科知识。“凡医、药等科,所应具者已大致布置完备。”因学生人数增多,扩

编学生为4个连,增设连长1员,以赵铎、顾邦楨、周馨、郅国圻为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医学校将“日本教官全数辞退,都由本国人担任教官”。除傅汝勤^④外,清末入职的各位教官继续供职,金宝善(浙江籍)、纪绪(药科,江西籍)也自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回国,进入该校担任教官。留美的陈辉、林鸿(广东籍)、郑淑等分任医学各科教官,另有药科教官5名,“其中以留学日本者为最多”,此外也有留学英国或本校毕业者。^⑤8月23日,袁世凯改以全绍清接任军医学校校长。^⑥1916年2月,学校鉴于事务繁多,设立校务会议,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此前所设4员连长主要负责实施军事术科教练,但因未设排长,在进行排级操练时“每觉困难”,自1916年起,由陆军部轮调各师军士赴校助理教练事宜。^⑦1917年3月,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四年甲级生孔祥选进入陆军军医学校任职。医院病室军医张瑞微于本校1917毕业留校。^⑧

学校为及时了解海外专业动态,比较注重教职员的海外留学培训。既然国内其他各校“皆于每届毕业生中择尤[优]派赴东西洋留学,一切费用由官支給”,军医学校也曾计划照此选派医、药两科学生留学。实际上,早在1905年,军医学堂即挑选优秀学生王秋岩等4人送往东洋游学。^⑨民国后,因财政拮据,北京政府终未派出军医毕业生留学,但为尽量作些弥补,以储备专门教学人材,陆军部决定每年轮派教官赴东西洋留学,咨请驻日公使向日本陆军省交涉,1917年春,首次派出教务长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军医学校学习。^⑩此后,陆军部规定,该校每年由本校教官中“轮流酌派一人,资送日本考查医学,以期邻邦之新学术次第灌输内地。每届以一年为限”。^⑪张仲山也回忆称,1916年后,该校“为深造教官资格及考查研究列国军医状况,曾数次派本校教官留学东西洋,相继归国后,教授军阵本科及研究科”。^⑫1917年10月12日,陆军部先后遴派教官2名赴日留学,专攻眼科和卫生科两门,以为军医学校开办研究科作准备。1918年秋,再派教官3人赴日学习。^⑬有些教官在留日期满归国后,因表现突出而得到陆军

部奖励。例如,1921年5月,校长戴棣龄呈文陆军部称,该校先前派遣赴日留学的医科教官王连中(直隶籍)、张仲山,药科教官胡晴崖和李斌荣4人,已编成学术报告及著作若干,请陆军部给予二等奖章。^⑭

(二)医药人材的分科递进培养机制

1916年,陆军部计划按照民初制定的《教育纲领》,在普通科的基础上,在陆军军医学校开办本科及研究、补习各科。鉴于校舍偏狭,同年冬陆军部决定将该校移至北京。1917年春,在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东四六条胡同东口的富新仓旧址一带开始建校。^⑮1918年7月,校长全绍清奉陆军部令,“本年暑假行将期满,拟定由津迁移北京,并令各班学生届时到京赴校”。^⑯10月15日,新校舍即将在北京落成,全绍清率领全体学生入京,“举行落成会”,照旧上课。^⑰1918年12月,校址竣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完成由天津向北京迁址的工作。^⑱新校址相当宽阔僻静^⑲,“左通本校附属医院,右邻陆军卫生材料厂”,自此学生实习更加便利。^⑳学校在原有设施基础上增设动物试验室、药科器械室、解剖器械室、物理器械室、细菌培养室、制药实习室、化学药品器械室、医化学实习室、生理学医化学器械室、军阵防疫研究室、作业室、培养基制造室以及冰室等。^㉑按沙林芳说法,学校“占地较广,系按照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建筑规模设计修造的。教室采用梯式座位,便于听课和直观教学,有解剖实习室、实验室、图书馆。校中央建有可容五六百人的礼堂,以及学员宿舍、食堂、行政教育各科室。附属医院建筑也比较完善,各处通道均建成避雨式走廊,贯通连接。在当时国内的医学院校中,其规模设备是较为完备的。在教学内容及教学质量方面也较为先进。”^㉒美中不足的是,该校“空着许多闲地,不建自修室”,学生“总要到讲堂自修”。^㉓

1912年9月后,学校按照新定规章,新加医学普通教育,以期渐进。本科及研究初习各科开办后,遂将医、药两科学生各自定为普通科、本科、研究科3等^㉔,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和课程。医、药两科学生的培养,初步形成递进式发展链条:

一是普通科。医科修业4学年、药科修业3学年，“以中学毕业生及有相当之程度者考试补充”，“养成普通医学、药学之人才。并授以初等勤务必要之学术”。其军医科设有26门主修课程，司药科设有20门课程，其中军事学、化学、物理学、细菌学、平时勤务学、战时勤务学、德文、日文、军事训育为公共必修科目，而军事学、细菌学为民初新增。军医科还开设解剖学、组织学、胎生学、生理学、医化学、药理学、诊断学、病理学、病理解剖学、卫生学、内科学、外科学、皮肤病学、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精神病学、法医学，“其他妇人科学、产科学、小儿科学，得由校长酌量加为课外讲义”。司药科还开设矿物学、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分析化学、卫生化学、药局方、药品鉴定、调剂学、制药化学、药品工业学、裁判化学。上述科目中，医科的精神病学和药科的药品工业学也属民初新增的课程。^⑤

这些科目的设置，基本参考日本医科各校。学员在一、二年级学习基础医学课程和日语、德语，自1913年起，每周还有一次马操训练。三、四年级学习的课程为临床医学。除学习一般医学课程外，还自1914年起，学习平、战时卫生勤务学以及阵地外伤救护、绷带学等，使课程设置更为全面，军事色彩更浓。“每周实际操作一次。各学科讲义系由日文医书翻译印成的。学校每学期进行三四次尸体解剖实习课，所用尸体均系服过刑的犯人，实验结合课程进行教学。在医院临床实习时，由教官指导和示范。”^⑥1916年起，普通科的外语教学不再局限于德、日两种，加授英文^⑦，较大地便利了学生对于国外专业知识的获取。

二是本科。医、药科本科均为一学期至一学年。^⑧招收由该校普通科毕业或医药学校毕业经过部队见习者，以及卫生部门初、中等官职而未经本科毕业生，教授他们中等军医勤务所必需学识，以备深入研究高等医学。军医、司药两科除国际公法(附红十字会条约)、德文、英文、军事训育外，不再像普通科阶段那样有更多的共同科目，军医科还开设军阵卫生学、军阵防疫学、军阵外科学、军阵内科学、选兵

医学、战术学、地形学、野战卫生勤务学。司药科另开设军阵调剂学、军阵卫生化学、比较药局方学、军阵制药学、医疗器械学。^⑨

三是研究科。陆军部认识到，“各国陆军军医学校皆设有专攻科，每年由各师团抽调现役军人，入校研究专科，此项专科学生系随同教官研究学术，兼服医员助手之职务。教官有专攻生之臂助，研究更易进行；专攻生得教官之指导，研究始有门径。”因此在《教育纲领》中特设研究科，招收军医学校的医、药本科毕业生或本科毕业之卫生部门初等及中等官职志愿深造者，培养高等军医勤务和研究人才。其修业年限和具体所设科目不定，由教官授以问题、示以方法，令其自行研究，“现充军职者，带领原薪”轮流入校深造。“嗣因军务倥偬，军队均已出防，未克举办”，1920年初，陆军部“决定飭由军医学校即行组织研究科，以便选集学员更番研究”^⑩。1921年2月，全绍清为此特呈请陆军部飭令近畿陆军第1至10各师及第16混成旅，选送曾在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副军医官、司药官、军医长、司药长等入校学习，其中，陆军第1至4师各派医、药学员各1人，其他各师旅各派医科学员1人，“该校此次研究科医科中分兵眼科、防疫科、耳鼻咽喉科，药科中分军阵卫生、化学及各军阵制剂”。^⑪

四、陆军军医学校的招生政策及其变动

虽然国体由帝制转入共和，但陆军军医学校在招生上暂时沿用前清做法。1912年8月，该校按照陆军部指令，招取官费医科学生50名，定于9月25日在本校内查验身体、分日考试，志愿报考者须“亲到天津河北黄纬路本校内报名，道远者准其先行投函报名，并于查验身体时，各携相片以便查对，如无相片者，不录。”招生简章列出对应考者的各项具体要求：体格方面须“体质强健、无隐疾残废疾及精神疾”；年龄要求与前清有所不同，须自20岁以上25岁以下；考试科目包括汉文、初等物理化学、算学、代数、几何、外国文(德文、日文或英文)。学制5年，其中包括普通医学科4年、军医本科1年。实行公费制度，“所有食宿、被褥、制服、纸张、笔墨，均由本校发

给,概不收费。”^②陆军军医学校这次医科招考,因属民国成立后首度招生,社会反响强烈,“闻报名者已有二千余人,拟于日内先行查验身体内脏、皮肤有无病症,一俟将身体验毕,出榜凡取入者,方准投考。”^③

9月初,陆军部在该校《教育纲领》中规定,每年学生招考前夕,“各科学生之额数及入学日期,以陆军部令告达之。”除正式招考外,“由陆军部飭送及其他学校拨送”。各科学生入学时,须填写入学誓言书,送呈陆军部存案。在学生待遇方面,“普通科及本科学生之被服、膳费,以官费支给之。”^④除入学誓言书一项外,以上内容基本是对旧日规章之沿用。

1913年6月7日,陆军部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和各省都督,军医学校医、药两科,续招新生120名,按省配定学额:直隶10名,江苏9名,浙江8名,山东、河南、四川、广东各7名,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山西各6名,安徽5名,陕西、广西、云南各4名,奉天、吉林、黑龙江、甘肃、新疆、贵州各3名。希就18岁以上25岁以下、素无过犯和不良嗜好、体格强健之中学以上毕业生中,照数考取,取定后派员随带各生试卷、毕业证件及相片等,于8月1日以前将该生护送到天津本校报到,听候陆军部定期覆考,凡及格录取者,除原有官费如旧外,每生另给津贴2元;“不及格者,仍由护送员带回原籍”,并于“选定后先期电覆”。^⑤由此可知,此次招考条件在年龄限制上较以前稍微放宽,且提高了学生的待遇。

基本掌握招生原则后,有些省份拟定出本省招生办法。6月中旬,直隶省出台招生办法8条,除额定10名外,自行设定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理化、博物、英文、数学,报考资格依照陆军部所定,于6月21至7月15日之间在直隶行政公署报名,届时呈验4寸半身最近照片及毕业文凭,7月18至20日在天津河北公园学会处进行考试。^⑥山东省则采取简单办法,只是发出牌示:“凡曾在中学以上毕业生,愿入陆军军医学校肄业者”,按照各项报名资格条件“前来报名,听候示期考试,选录咨送,幸勿自误。”牌示内列出大致招生要求,报名资格按照陆军部所定,但应考者须在7月5日前在指定地点完成报名填册手续,随

缴6寸全身软胶纸相片两张。考试科目包括国文、地理、历史、算学、代数几何、化学、物理、英文8科。^⑦7月11日,广东都督陈炯明公布《招考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新生布告》,令报考者须在7月13日以前,“亲带六寸软胶正面半身相片三纸到本府报名,并将毕业文凭呈验,听候示期考试”。^⑧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已决定武力对付南方国民党控制各省。赣宁之役起,7月21日,陆军部急行通电各省都督,“查现在情形,前议应暂延期,俟局势稍定,再行定期电达,其有考送学生现已成行者,亦祈速令折回,以免徒劳”。^⑨此前直隶已将额定10名学生取定,虽在北方,也因此暂行缓送,直至战事平息后才得传集入校。^⑩9月4日,陆军部致电黎元洪和江西、安徽、江苏、广东4省民政长,“仍希查照6月7日通电,按额考送,务于11月1日以前到津赴校投到,并希先期电复”。^⑪11月初,校长李学瀛和陆军部所派考试官联合发榜:“查有直隶等十七省学生业已陆续投到,当经分门覆试,评阅试卷成绩,所有录取各生,合亟分别甲、乙榜示”,“该校此次取定医、药科新生,已于十三日下午入学。”^⑫赣宁之役后,新任江苏都督张勋为笼络人心,向陆军部争取更多推荐名额,由原来的9名增为20名。11月11日消息,张勋谕令本省合格者报名择期考试^⑬,尽管此时该校的报到日期已过。

1914年6月,陆军军医学校招考新生50名,医、药两科学习年限分别为4年和3年,且各加队附见习4个月。待遇如旧。但特别强调,各生毕业后,“应服从陆军部指挥,专在军界服务,倘任意改业,或无故中途退学,历年发给各费,均须一律追缴”。报考各生在年龄规定方面再次从严,回到民初的20—25岁的限制。应考者须体质强健、无隐疾、残废及精神病,且须是中学毕业生及与中学毕业相当程度或曾在各医学校修业有证明书者。与此前招生条件不同的是,每位考生须有人担保,“保人须以在京供职荐任以上文武官为限,该生于修业期内一切行为,保人须负完全责任”,在报名时,“须呈验文凭或证明书,并填注志愿书,附缴本身四寸相片”。报名时限比较

宽松,近19天,逾期不录。报名结束后的第三天开始考试。考试科目为:体格、国文、外国文(以英、德、日三国之任一种为限)、算学、化学、物理学、博物学。该校自6月17日起直至7月15日在《申报》连续刊载招生广告。^⑩

学生入学虽多为官费,也招少数自费生。例如,1913-1914年间,有一位名叫段天槐的学生,自费入校学习,后因经济问题承受不起而请改官费,无奈三次不得。但有一福建籍学生,“并未经过考试,持陆军部一信,谒见该校校长,居然补入官费。”段天槐闻知此事,特致函陆军总长段祺瑞,请“得总长一函与该校长,已可补入官费”。段祺瑞同意在近期将其改补官费。^⑪

1916年7月初,陆军军医学校招考新生80名。医、药两科学习年限分别为5年和4年,其中已包含见习期。报考资格中虽不再提及年龄限制,但须“以曾在中学校毕业,及有相当程度,身体强健,坚忍耐劳,汉文精通,并英文能直接听讲者为合格”。报名时限较以前略微缩短(16天),凡欲投考者,各携带最近4寸半身像片及毕业文凭证书,前往本校报名,“并缴试验费一元,不录者概不退还”。报名结束后第2日起开始考试,考试科目也较此前简化,只有检验体格、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6项。取定考生“应觅具妥实保人之保证书缴校备案,如学生有犯校规,被革或中途辍学者,此项保证人有代为追缴或赔偿学费之责”。^⑫

1917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招收新生,减为50名。年龄再次强调须“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曾在中学校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为合格”。报名日期较上年缩短至10日,应考者各携带最近4寸半身像片及毕业文凭证书,前往本校报名。应试科目除检验体格、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重新强调在外国文方面,英、日、德文均可,不再只限英文。^⑬1918年9月初,陆军军医学校再次招考新生,增为70名,报名日期再次缩短为1周。在考期设定上,不再如以往间隔几日,报名截止次日即开始考试。^⑭因投考学生中合格者较多,最后录取80名。^⑮

1919年7月,陆军军医学校招考新生,与以往不同的是,明确新生医科45名、药科15名。报名时间再次缩短为5日,报考者在报名时须声明所报为医科还是药科。考试日期与报名截止日期仍未间隔。绝大多数考试科目依旧,只是将原来的数学考试改分为代数几何。^⑯1924年7月底,军医学校续招新生60名,“计报名者约六百人,与考资格为中学毕业生”。8月1日早8时起先施行体格检查,3日“发检查体格及格与否之草案”,在“下星期内,分期考国文、英文、数学、物理、理化各门。”^⑰

1925年,陆军军医学校招新生50名,其中医科35名、药科15名,学制重新回到民初办法,即医科4年、药科3年。报名时间明显较以往延长很多,基本回复到1916年的做法,近16天;考生也须提前注明所报科目,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须“缴报名费二元,无论取否,概不退还”。考试日期也回复到旧日比较宽松的做法,即报名结束隔5日再行招考。考试科目虽沿袭以往内容,但在体格检验时强调,凡体格不合者不得参与其他各科诸试。学生待遇虽仍坚持官费制度,但也大不如前,除每月津贴二元外,只有“服装、膳宿均归校备”。不再要求保人出具保证书,但有了更加实质的内容,即保证金制度,“学生考取后,每名须先缴纳保证金一百元,方许入校,至毕业时发还。”^⑱

到1928年前后,陆军军医学校在招生方面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医、药两科的学制虽然延续以往,但明确提出“各加队附见习三个月”,学生“录取入校时,须填具入学试验书及保证书,并缴纳保证金百元,毕业时仍照数发还。”“学生均住校内,其被服、膳食、笔墨、纸张及实习消耗品等,均由学校支给,每人每年只须略备另用一二十元。”也就是说不仅不再有往日的每月津贴,学生尚须自备10-20元不等作为零用。学校规定:“本校毕业后,由陆军部分发各师见习,期满分别补授军医、司药实官,并派往各师旅服务。”因学校经费受限,只有等到有班次毕业时,才会招收新班。但1928年初已不招新生。^⑲

整体来看,陆军军医学校在招生方面始终未遇

到什么困难,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学员中父子、兄弟、亲朋先后同学毕业者不在少数,因此形成军医学校师生、同学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互相援引照顾。”其原因大概如下4种:“一是军医学校是公费,可以减轻家中负担;二是毕业后工作有保障;三是毕业后开业行医可以名利双收;四是学校有熟人可以照顾,考取比较容易。”^⑩

五、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学管理

按照《陆军军医学校条例》规定,普通科及本科学生住宿校内,“各科学生须遵守军律、校规,服从校长、教务长、教官、助教之指挥,并受学生监之管束。”^⑪连长“负责学员的军事操练和军纪的检查。每周放假一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即可回家,星期日晚八时前必须返校。宿舍每间住六七个人,晚上自习到十点睡觉。作息时间规定很严,均以军号为准。”^⑫

学校各门功课“须选有专长之教官主讲一门,或兼讲其有关系之第二门”,“讲义专用国语,医药专有名词须以拉丁文为主,惟研究科讲义可添用外国文教授。”“普通科参考书,以日文为主,兼采用德文图籍,以资佐证。本科以上者,不在此限。”各科均以理论与实验相辅教学,先授学说及实施法,然后实地练习。实验分试验室实验、病院实验(材料厂实验)及军营实验。^⑬

学校制定有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普通科学生考试分临时考试与学年考试,前者由各任教官临时举行;学年考试在学年之末进行。专业课程修满之后,举行毕业考试,“但普通科生之毕业考试,须在其最终学年考试及格后行之。”学年考试、毕业考试,由主任教官就所授课目分别命题,届时陆军部临时委任监考官莅临监考。考试结束后,由校长会同监考官、教务长、教官及学生监对学生成绩评定甲乙等级,作为年级升降标准,或者经陆军部军医司核定后,呈请陆军总长发给毕业证书。其考试办法“除就实地考试用口答外,均用笔答”。至于该校的各种教育细则,由校长遵照《陆军军医学校条例》及《教育纲领》拟定,然后呈请陆军部核准施行。^⑭陆军军医学校每届毕业典礼前夕,呈请陆军部派员莅校监临,

“赐训给章”。^⑮

民国初创,陆军部希望对包括陆军军医学校在内的所属各校实行严肃的校规以整肃本校风纪,尤其强调德育操行成绩。各科学生须遵守军律和校规,服从学校教职员指挥,并受学生监管束。学生“不得以一己之从违,请求退校”。但若有“两次落第,不堪造就者”“屡犯规则,紊乱军纪者”“品行不端,屡戒不悛者”或“伤痍疾病,不堪修学者”,校长在呈报陆军部后,得令该生退校。^⑯学校“除拟定罚则若干条外,并建筑黑屋一处,其学生过犯较重者,或罚三日或五日,惟上课时仍须照常办理,课毕照旧拘役,以示惩警。”^⑰如《大公报》曾报道:陆军军医学校学生王某“因违犯校规,被校长照章科罚一年,不准出堂,并交连长随时查看,以观后效。诿王某情不甘服,具禀分辨,言语甚为激烈,昨被校长革除,以示惩戒。”^⑱

不少学生在入学后因各种原因离开学校,对于久假不归者,陆军部一般给予开除处分,同时要求“各军事机关不予录用”。^⑲例如,1917年3月中,该校医科第一年级甘肃宁侠籍新生荣勋,即因违反本条禁令而遭开除。^⑳1919年,毕业生郑承铭被分到西北军第2旅见习,“期内请假离营,逾限不归”而遭除名。^㉑学校对于退校学生起初“只就伙食、津贴两项追缴”,1914年9月,陆军部以这种追缴办法“未免失之轻纵”,要求该校对退校学生,“除两次落第不堪造就暨伤痍疾病不堪修学,确有证据者,应准免追学费外,其余退校学生,应就本校全年经常费总数,以学生名额核算,每名分担若干,按照该生在校年限,照数追缴;不及一年者,仍以一年计;过一年者,照年加计。”^㉒学校还在毕业考核方面施行比较严格的规定,1916年夏,即将毕业的学生竟有36名被强令降级留校,还有6人辍学,当年仅毕业78人。1917年夏又有14人被降级,16人辍学。1918年下半年有9人辍学,下半年有9人被降级、10人辍学。^㉓而对于违反毕业分配纪律者,亦有严肃处理,如1920年4月中旬,该校医科毕业生王伯炎入陆军第9师候差,“逾期多日未归”而被开除军籍。^㉔7月中旬,毕业生李克潜、王

衍庆,经由陆军部派往陆军第20师候差,“乃该生等久未投到”也遭开除。^⑤有回忆者称,学生毕业后,“有不愿到军队去的可自行开业,或参加地方医院工作,因此到部队当军医的只有极少数人。学员中有留学德日美等国深造者多人。”^⑥按照陆军部相关规定,学生是不能有这种选择的,但这种现象却揭示了军医学校学生的出路选择问题,即有些学生并未按照陆军部禁令而皆入军界,前述辍学、逾期未归者或已到社会自行谋职。

学生毕业之际,陆军军医学校还经常举办或参与相关展览会,以展示该校学生的学习成果。早在1911年,《北洋官报》在学生毕业前发布消息称:“天津陆军军医学堂药科头班学生现届毕业,所有历年制成药品及卫生试验成绩等项,定于本月十三十四两日在堂内开展览会一次,业经函请各界诸君随意入览”^⑦。1915年7月2日上午8时,陆军军医学校借举行医、药两科学生毕业仪式之际,举办了比较隆重的附属医院开幕礼及药科展览会,事前“通函各界届期与会参观”。^⑧这一举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展览会原定7月2-3两日,虽逢雨天而“参观者甚众”,特在7月4日《大公报》刊登广告一则,“展限一日”^⑨。1916年,教育部开办全国专门学校成绩展览会,军医学校经陆军部审核后,将本校医药科成绩作品咨送展览会,参评奖项中包括有图表81张,标本117种,自制药品及染料等件237色。^⑩

军医学校有时还组织学生参与实战医疗训练。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发,讨逆军组织军医学校医、药两科教官和学生成立讨逆军医队,由校长带领至前线救护治疗受伤官兵。^⑪同年秋,学校组织临时诊所,赴津埠灾区救治灾民。1918年2月,学校医、药科三、四年级学生多名赴绥远协助防治鼠疫。^⑫短暂的战时救护训练自然必要,但自直皖战争以降,军阀内战迭起,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学生屡次参与救护工作,极大影响该校的正常教学。

1918年12月1日下午4时,校长全绍清为体现学校新迁入京的新气象,特率领医药两科学生200余人乘车入京,“送由陆军部分别考试,以备挑选录

用。”^⑬此时,在校生一直维持在医科4个班、药科3个班的办学规模。后因办学经费紧张,学生逐年毕业,却不能按期招收新生,仅剩医科专业本科学生三、四年级各1个班。^⑭1925年6月10日,医科第16期43名学生毕业^⑮,这是笔者目前可查到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该校最后一期医科毕业生,而最后一期(即第8期)药科毕业生则于1920年8月离校。^⑯在惨淡经营中,该校陆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军事医药专科人材。

六、学校附属医院的开办与经营

清末,军医学堂医科专业本科生以天津官医院为实习处所。^⑰民初,陆军军医学校遵照《教育纲领》,于1915年初请准陆军部,在学校旁边设立附属医院,作为“疗治陆军伤病人员及学生实地练习之用”,考虑到“工程尚需时日”,决定自2月1日起“开院送诊廿天”。医院订有一切章程,^⑱分设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小儿科、花柳科、皮肤科,“各有主任,除星期日停诊,每日自上午九钟起至十二钟止,如遇急病,亦可随时来院诊治,并分特等、头等、普通三项,以便病人住院疗养,概不收取药资,祇收养膳费,而每人号金只纳一角,其内科取药,外科药皆不取费,如系赤贫者,并允免纳号金”^⑲。有说法称,附属医院除上述科目外,还有耳鼻喉科、辐射线科,有门诊部 and 病房,“凡赤贫患者可为临床讲课之用时,可免费诊治和免费住院。”自此,学生实习大为方便。全绍清任校长时,聘请英人孔美格负责附属医院内科临床化验,委派留日教官金宝善负责细菌检查。^⑳

附属医院在方便学生更好地进行专业实习的同时,积极服务社会。1916年2月,因就诊者日渐增多,附属医院将昔日专设的军医病室裁撤,在原有治疗主任1名外,又增设2名,其余医生皆由本校教官兼任。8月,陆军部又派定医务主任1员,添设看护兵5名、司药实习生4名,分别负责药剂的调配和保管。^㉑鉴于医生不够用,军医学校规定,“学生从第三年起,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到医院门诊看病”。每日上午8-10时完成两节课的学习后,即于10-12时在医院参与诊治。此前,先由教习到医院了解就诊患者

的病况。一些实习学生为突出实习成绩,通常避重就轻,选择患病较轻者,以致病情复杂严重者,留在最后没人愿看。教习遂将自主选择病人诊治改为平均分配病人给学生,“并且在挂号证上同时写上病人和学生的名字,该谁看就谁看。病情复杂的,教习都得重新检查,以免出错。”^⑩附属医院治疗患者逐年猛增。1916年治疗患者1.0457万人,1917年患者增至1.3297万人。1918年附属医院新址落成,当年共治疗患者1.9292万人。^⑪正是借着这些日渐增多的医疗救助活动,学校教职工及实习学生不断地积累着临床经验。

1915年,附属医院专设解剖室,以进行人体解剖。^⑫1921年4月中,该校联合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协和医学校公呈内务部:“医学进步,端在解剖,非解剖无以知身体之构造,非知身体之构造,无以定诊治之方针。我国人士于解剖之功用及医学之关系,多不了解,加以社会心理,引剖解尸体为禁忌。民国二三年,部令虽有解剖尸体、提倡医学之规定,而地方官厅仍徇习见,成效鲜睹。比年以来,所领尸体每年至多不过六具,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每年能领至六百具者,相悬甚巨。应请内务部令知各主管厅署,嗣后凡遇路途倒毙或贫民院之尸体无亲属到领者,即电知陆军军医学校领取回校,以备实地剖验,共同研究,以促进步。”^⑬

1919年2月初,附属医院奉令由天津迁入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并于12日发布广告,决定自15日起,“就内科、外科、眼科、皮肤、花柳科先行开诊”,“就诊患者分纳费及免费者,每次收铜元十枚,药费治疗费另计;免费者只收挂号费二枚,药费治疗费一概免收,军人身著制服者,照免费者办法,只收挂号费二枚,以示优待。”“除星期暨年节例假日照例停诊外,每日上午八时起挂号,十时开诊”,并公布联系电话(东局2855号)。^⑭

对于迁入北京的附属医院,坊间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称“该校处地偏僻,所属医院惠顾甚少”。1920年后,附属医院因经费紧张,对患者“增收各费,病者裹足不前,每天只有几名免费的大兵,去壮门

面。”1921年,“医院不开,也不临症,器械不全,材料不备”,学生也自然不去实习,无事可做。^⑮1922年4月初,学校已无人照料。10日下午,基督教各省同盟大会代表百余人搬入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居住,医院几成旅店。^⑯6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戴棣龄为陆军军医学校校长,陈辉为教务长。^⑰尽管如此,附属医院仍无明显起色,不久即因经费短缺而陷入停诊,竟达年余之久。新由附属医院院长接掌学校校长重任的张用魁“鉴于学生实习旷废日久,不忍坐误青年,兼之入春以来,时令不正,人民染患杂疾者甚多,故极力筹划”,决定于2月25日重新开诊,“一般市民当获利益匪浅”。^⑱张用魁也借此终于谋得了晋升的资本,3月15日,北京政府正式将戴棣龄免职,改任张用魁为校长^⑲,由此完成了任免程序的过渡。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附属医院常常收容伤兵,1924年直奉战争时,该校设立临时医院,收容伤兵3000名以上。当时,学校和医院两处房舍,均被部队占驻,加因年久失修,毁坏颇多。^⑳

七、军医学校在办学经费紧张中走向没落

1920年年底,北京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也反映到陆军军医学校的办学经费上来。至1921年4月初,“因财政困难,积欠教职员之薪金已达五个月有零。教职员自己情愿遣散,另谋生计”,“该校前曾以一度非正式之呈请裁并,而陆军部以欠款无着,未便应允,现在该校校长全绍清乘此万难之际,已谋得派赴美国调查之差,领足八千元现洋而去,校务由本校教务长戴棣龄(兼长安医院院长)代理校内,一文莫名,支持维艰……教职员之薪金尚不属弟[第]一难题,所最困难者,学生之伙食向由校内供给,刻下有在陈绝粮之厄,而教务长更不能为无米之炊,倘欲接踵他校相率罢课,该校以直辖陆军部,又与他校性质不同,说者谓为欲罢不能云。”^㉑到5月初,北京政府财政更加艰窘,遂“以裁撤军队号召天下”。军医学校“即因经费无着及毕业生无处安置两问题,有暑假停办消息。”^㉒学校因无人悉心照料,12月12日傍晚,校内“突然起火,延烧房屋多间,当由消防预防各队及美国救火队前往扑救,至六时始熄”。^㉓至1922年初,

因积欠经费八月有余,陆军部却只发下一成款项,“眼看旧年在途,各处积欠无法筹措,学生伙食快断炊了,现在外欠太多,难以续赊,不过由校长赔垫,军需官走避不照面,学校的煤炭也要烧完,现在每天只领原数之半”,饥寒难耐中,因畏于军律,“教员只有相约请假,明说是问学,只有聚一帮人来吃饭”。学生也无心上学,“年假回家,托故请假,来一封信就行。但是一回学校,决不轻易放出……住在学校里,也不上课……也不实习,整天没事作。近来有人主张请示办法,又有人主张请放寒假,终日议论,难得良果。学生方面只知无理由的服从,有什么意见万不敢发表。”^⑧

1922年7月中旬,该校负责人与陆军部其他机构“连日向部索薪,毫无结果”。^⑨经费困难使得学校“不能按原定计划招生衔接”。^⑩尽管陆军次长金绍曾应允“每机关先发二千元”,至8月初“尚拿不出”。军医学校“本年暑假虽应添招学生”,校长戴棣龄“因经费实在困难,教员、学生均难维持,拟请从缓办理。而陆军部为支撑门面起见,依然嘱咐该校照常招生。闻此事业经陆部议决,戴校长正在计划招生,筹备一切云。”^⑪笔者未见该校本年招生告示,可能招生事宜终究作罢。

学校经费异常艰窘,已至无法维持境地。有些教官在校外寻找兼职或另谋职业。如沈王楨在北京开业;王冠三在天津开设眼科医院;张禔人在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担任教员,学校有课时,才由天津、保定赶来北京上课,非常辛苦。学员伙食及津贴待遇尚能维持,没有中断。^⑫一些教官改投军营担任军医,如潘承禄投靠直系吴佩孚,负责全军军医事务。^⑬陕西籍教官王清源改投察东镇守使署担任军医官。^⑭如前所述,即便校长戴棣龄也兼任长安医院院长。既然生活可在别处寻求保障,1923年5月初,“该校教职员特提出总辞职”,学生们一面挽留,一面呈文总统曹锟及陆军总长,称:“属校薪饷,积欠经年。虽经全前校长补且于前,戴今校长维持于后,然而无米之炊,巧妇难为……矧属校学关医药,系人性命,医院实习,药室调剂,日日资用,在在需财,既非

讲述所能了事,尤非徒手所能支撑,且属校校长及教职员枵腹从公,已非一日,欠饷以来,典衣自食,借债贍家,苦心孤诣,以至今日……今者维持之力已穷,而积欠之饷不发,居此米珠薪桂、宁无剥床以肤之痛。且又索薪不敢,自食无方,故不得已而出于辞职。窃念教职员之辞职,于生等学业前途,关系至巨”,请补发积欠、指定校款,维持校务。^⑮这种诉求根本改变不了学校现状。6月中旬,包括军医学校在内的陆军部所属教育机关的公费薪饷,积欠已达15个月之久,校务“现已完全停顿”。6月12日下午2时,各校索薪代表齐集陆军部,向军需司司长赵乐亭陈述苦况。“赵谓总长辞职,次长请假,我亦无法可设,不过节前口须设法点缀。代表又要求与部内一体待遇,万不宜再有所厚薄,赵允照办,各代表退后,即在四条胡同宪兵学校讨论继续办法,议决每日轮流代表赴部坐索,不达到目的不止。”^⑯

10月前后,军医学校开学,“但久未照常上课”,因经费积欠已达19个月,“此后又不能按月发放,诸教官多另谋生活,现校长设法,凡上课者,一小时给现洋两元,俾教官或可到校维持,以此呈于陆部。此款无论如何,必须按月发下。陆部以有钱则发,没钱则已封。该校长以长此以往,对不起学生,遂于前日向部辞职,一面令文牒课转知各课,速办结束,以便交代。学生方面得此消息,立行召集全体大会,由众议决二项办法如下:(一)派代表挽留校长,至不得已时,亦请其在部令未下前,照常到校维持校务。(二)派代表持呈文赴陆军部见总长,陈述苦况,请其即时发经费维持开课。”^⑰几经争取,陆军部“已允尽先支给以后之经费,加之学生方面之再三恳切挽留”,校长戴棣龄终于11月27日到校复职,“并已定于二三星期内,将附属医院开诊,以便学生实习”。^⑱戴氏原为本校教务长,对该校自然甚为了解。但其校长职位依然少不了外行觊觎。1924年1月中旬,“兹闻前日由陆军某司长授意,嘱令赶递辞职书,该校长当即照办,昨日果由新任陆军总长颁发部令,委任张用魁补充斯职。据云,张用魁系陆军第九师军医处处长,前亦曾充当军医学校附设之军医

院院长,谋得校长,已非一朝一夕”。^⑩

此时的军医学校可谓祸不单行。驻京英国公使麻克类(MacLeay)为军医学校积欠英商屈臣药房、利华洋行等款项及英籍孔教员的薪水问题,向北京政府催索。北京政府随即将利华洋行的部分欠款结清,然而,“屈臣氏、孔教员等款尚未付清”,4月16日,英使特再函北京政府,“请转知该管机关将该款从速付还。倘一次不能如数清结,务于本月内尽力筹付若干”。^⑪

1924年7月中旬,军医学校另在该校北侧附设治疗所,“每日上午施医,以便在校学生实地练习”。^⑫张用魁的新举措未及奏效,他本人即因直奉战争中直系的失败而受到株连,其职务由军医司医务科科长张修爵于11月20日接替。^⑬此时距其实际主持校务尚不及一年。张作霖、冯玉祥两股势力迎接段祺瑞回京担任临时执政,陆军部随即将本部办公地址让出,另选军医学校暂作办公地点,该校则被迫迁移至陆军兽医学校附设病马厂内。1925年3月中,陆军部迁至福佑门院秘厅旧址,军医学校迁回原有校址。^⑭在北京政府看来,这一教育机构地位无足轻重,对其取给也就随意许多。张修爵在该校校长任上维持一年,学校仍未见起色。1926年4月1日,北京政府改任梁文忠为该校校长。^⑮梁继任后,试图有所革新,终“以经费支绌,办事困难,再三向陆军部辞职。陆部以挽留无效,遂命该校教务长陈辉升充”。^⑯北京政府或许不想给时人留下一种随意处置该校人事的印象,依然对陈辉采取“试用”制度,直至11月19日才正式发出任免校长之文书。^⑰

此时奉系已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陆军军医学校自然也完全为奉系军事活动服务。随着国民革命北伐兵锋的迅猛推进,战事更趋紧张。1927年10月初,镇威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因前线士兵遇有受伤运往北京者,苦无医院收容,兹闻已择定东西六条东口军医学校院内,设立后方医院,以便诊治伤兵”。^⑱校长陈辉对于军医学校事务已无企望,向军事部呈请辞职,1928年2月18日,军事总长何丰林为此转呈张作霖,并请以鲁景文继任该校校长。^⑲

犹豫几日后,张作霖于2月23日正式下令,由鲁景文接掌该校。^⑳校长频繁更迭的背后,是北京政府内部派系斗争的加剧和所用无人。此后数月间,校长更迭速度更为频繁,先后有郝子华、杨懋接任校长,又先后改以戴棣龄、陈辉继任^㉑,终无力回天。6月,张作霖势力退守关外,校长陈辉负气出走,“学生会因校内负责无人”,遂共举供职该校20年之久的教务主任张仲山代理校务。1928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占北京,派员接收陆军军医学校,继续由张仲山维持校务。^㉒

总之,民国陆军军医学校基本是清末陆军军医学堂的延续,从1901年的开创到1928年北京政府的垮台,陆续培养一大批学生,尽管不敷分配^㉓,但不能抹杀这所学校在中国军事医药乃至近代医药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对于这所学校来说,1907年,陆军部对其接管与建设,是该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无论是制度建设、课程设置还是招生培养方面,都为日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入民国后,1912年的《教育纲领》成为此后该校人材培养的重要指针。在招生方面,陆军军医学校虽然在资质条件方面每年都有所变通,但基本做到有序进行。学校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保证了毕业学生的质量。为使得学生有更好的医学见习和实践场所,学堂起初从日本购置尸体和模型,来完成解剖学课程;在陆军部接管之初,学堂仍未设置解剖室,只能组织学生去天津市医院进行尸体观察和解剖以及内外科的实习教学,后来才开始使用一些罪犯尸体进行专业解剖。1915年后,附属医院的设置,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学校师生的医学实践,而且为其扩展社会服务提供了可能,也为日后各种军事医学机构服务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模板。

但是,民国北京中央政府始终在财政赤字基础上运转着,其不断举借外债以致社会声誉接连降低,且“卖国”名声在20世纪的政潮中一次次叠加。至20年代初,陆军军医学校亦如其他陆军部附属机关一样,经费十分紧张,但并未因国家政权的更迭而倒闭,反而因应国家的需要而得以继续存在。这也是民初许多教育机构在时代转折中难以幸免的痛苦经

历。从这个角度看,缕清清末民初陆军军医学校的曲折发展历程,对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1930年代中期,学术界已开始关注该校,医学史前辈陈邦贤因“未能搜集”到该校有关史料而引为憾事。(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0页;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374页)1940年代初,楼方岑指出,军医学校“虽然曾有过一个美丽的童年,但她的少年时期是悲哀的,青年时期也是黯淡无色的”。(楼方岑:《陆军军医学校》,《学生之友》1942年第5期)还有人称该校“因囿于军阀时代之‘故步自封’及频年内战之囿于政局,虽有其悠久之历史,然极鲜长足之进步。”(《陆军军医学校概况》,《西南医学杂志》1942年第2卷第9期)两种说法都未给出具体史实佐证。即便是在清末民初一直供职该校的张仲山也曾妄下断语,称该校“创办于庚子”,即1900年。(张仲山:《军医学校之我见》,《军医杂志》1928年第1期)

②史全生等学者利用《袁世凯奏议》《政府公报》和《北洋陆军史料》,对清末元鼎革前后的陆军军医学校人事管理与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介绍。(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1-92、176-177页)袁伟等学者利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对该校的设置、教育纲领、课程及所设附属医院等情况展开研究,限于史料,该著只涉及1918年冬以前陆军军医学校在天津的情形。(袁伟、张卓:《中国军校发展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204页)与前述成果相比,龚纯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迁移北京后该校的招生、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等。(龚纯:《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183-185页)魏国栋结合《大公报》等报刊史料,对清末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的发展沿革进行了一些梳理,尤其是对学校的招生考试、课程设置做了更为详细的铺陈。(魏国栋:《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历史沿革》,《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③吴羽白:《首都医同学会开会记》,《申报》1928年12月1日,第19版。

④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3页;《筹设北洋陆军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各学堂折》(1905年3月28日),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11-1112页;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16年,第249页。曾在该校学习的沙林芳将北洋军医学堂的前身直接指认为李鸿章开办的北洋医学堂,有误。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下文《文史资料选编》编辑、出版信息从略)

⑤刘国柱:《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30-231页;龚纯:《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第138页;郭秉璋:《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下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编辑、出版信息从略),第684页。需要指出的是,很多研究著作将徐华清误写为“徐清华”或“徐清化”。

⑥《军医学堂》,《新民丛报》1903年第27期;《建造军医学堂》,《同文沪报》1903年3月5日,第3版。

⑦《拟设军医学堂》,《大公报》1905年6月25日,第3版。

⑧郭秉璋:《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5页。

⑨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8页。

⑩《军医学堂章程》,《申报》1903年8月31日,第3版。

⑪《军医学堂招考》,《时报》1904年12月30日,第6版。京师东文学社是当时日本人在中国所办的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83年,第66-69页。

⑫《医学堂不敢实验解剖》,《申报》1905年4月21日,第17版。

⑬《军医学堂实习解剖》,《北洋官报》1906年第1116期。

⑭《筹设北洋陆军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各学堂折》(1905年3月28日),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册,第1111页。有些研究者据此将1905年认定为军医学堂创办时间,有误。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第176页。

⑮孟威:《原国民党军政部陆军军医学堂概况》,《安顺文史资料》第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安顺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7年,第1页。有研究者称,该校校址最先在河北某处,后迁天津。疑将天津的河北路误为河北。冉懋雄:《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药科与药学季刊》,《中国药学杂志》1989年第8期。

⑯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3页;陆军部:《陆军

行政纪要》，1916年，第249页；郭秉稼：《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5页。

①⑦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8页。

①⑧《天津大学堂北洋医学堂军医学堂体操改用华字口令》，《申报》1905年5月5日，第3版。

①⑨梁峻、曹丽娟：《清末医院概况》，《北京中医》2007年第8期

②⑩《军医学堂注重汉文》，《北洋官报》1907年第1294期。

②⑪《军医学堂添习体操》，《北洋官报》1906年第966期。

②⑫《军医学堂添建房舍》，《北洋官报》1906年第1080期。

②⑬郭秉稼：《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4页。

②⑭《军医学堂加课》，《北洋官报》1906年第906期。

②⑮《军医学堂提前开学》，《北洋官报》1906年第912期。

②⑯《军医学堂派生赴奉》，《北洋官报》1906年第1015期。

②⑰《纪事·军医学堂卒業》，《直隶白话报》1905年第1卷第5期。

②⑱薛愚主编：《中国药学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第357页。

②⑲《军医学堂招考新生》，《北洋官报》1906年第964期。

③⑩《军医学堂招考届期》，《北洋官报》1906年第972期。

③⑪该题内容为，“有桃二百一枚，能容桃一百二十枚之筐十七个，应计每筐若干枚。”《本省近事》，《北洋官报》1906年第978期。

③⑫郭秉稼：《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5页。《本省近事》，《北洋官报》1906年第1155期。据载：“陆军军医学堂占据了两个街区，一座巨大的方形楼则据有其地面之半，底层是行政办公室、课室和实验室。楼上是学生宿舍，每间卧室住4人，校区的另一半是个大操场，可踢足球或开展娱乐活动。”《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41页。

③⑬《军医学堂遣派学生观操》，《北京五日报》1906年第42期；郭秉稼：《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5页。

③⑭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16年，第250页。

③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第229页。后世研究者龚纯、刘国柱未能进一步考辨史料，沿用陈氏观点而无出处。龚纯：《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第138页；刘国柱：《中国医

学史话》，第230-231页。北洋军医学堂二期生郭秉稼回忆，“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改归陆军部军医司管辖，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迁入河北黄纬路新建的校舍”。郭秉稼：《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5页。

③⑯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16年，第250页。

③⑰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3页。研究者冉懋雄已经注意到军医学堂改隶陆军部时间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说法，认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另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该校改隶军政部，改名‘陆军医学堂’。同年创办药科，招收新生，学制三年，其第一期学生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冉懋雄：《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药科与药学季刊》，《中国药学杂志》1989年第8期）。但这一表述存在很大问题，未确定药科的创设年份，同时将“陆军部”误作“军政部”。另按冉氏说法：“药科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方设科长，统管本科教学行政事务，修业期改为四年，首任药科科长为郑寿先生。”

③⑱芹波：《军医学校药科简史》，《药学季刊》1943年第2-5期合刊，第105页。

③⑲《军医学堂定期开办》，《北洋官报》1907年第1513期。

④⑩《督宪袁准陆军部咨札飭军医学堂前定京师选送军医学生现已逾期，应准留额候送文》，《北洋官报》1907年第1409期。

④⑪《军医学堂试办简章》，《北洋官报》1907年第1425期。按沙林芳说法，“学员除供给食、宿、衣被、书籍等外，还有国家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白银四两。”此说不完全准确。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9页。

④⑫《督宪杨准陆军部咨军医学堂续招新生请由顺直八旗各中学选送札飭提学司查照文》，《北洋官报》1908年第1736期。

④⑬《学台批示》，《北洋官报》1907年第1380期。

④⑭哈恩忠：《清末陆军部兴办军医学堂》，《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④⑮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9页。

④⑯郭秉稼：《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堂》，《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6页。

④⑰《学部奏恳恩赏给总医官伍连德医科进士摺》，《政治官报》1911年第1246号。关于伍连德入职陆军军医学堂的过程，参见《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册，第331-337页。

④⑱伍连德：《得之于人用之于世》，《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第57页。

④⑲《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册，第341页。

⑤张仲山：《军医学校之我见》，《军医杂志》1928年第1期。按沙林芳说法，辛亥革命后，“日本教官陆续回国，即由中国留日的医、药科毕业生来堂任教。”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9页。

⑥《筹设通国军医学堂》，《时报》1908年5月25日，第3版。

⑦《军医学堂加额改章》，《新闻报》1908年5月27日，第3版。按沙林芳说法，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医科学制为五年，药科学制为三年”，即是1908年5月之后的事。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8页。

⑧《军咨处奏详核红十字会原奏敬陈管见折》，《申报》1910年6月19日，第26版。

⑨《督宪杨准陆军部咨军医学堂续招新生请由顺直八旗各中学选送札飭提学司查照文》，《北洋官报》1908年第1736期。

⑩《医事新闻：军医学堂招考》，《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

⑪1910年东北鼠疫发生，伍连德号召学生前往东北施救，自荐者则是两位广东籍四年级学生。《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册，第341、342页。

⑫《督宪杨准陆军部咨以徐华清充俄使随员，札委伍连德暂行代理军医学堂总办文》，《北洋官报》1909年第2104期

⑬《陆军部奏陆军军医学堂第三班毕业生拟补官阶折(并单)》，《新闻报》1910年6月26日，第6版。

⑭郭秉璋：《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6页。

⑮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4页。

⑯《政府公报》1913年2月19日，第283号。沙林芳称全绍清为首任校长，当误。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9页。

⑰《陆军部呈大总统拟订军医学校校章分条缮折请鉴察备案文并批》(1912年9月9日)，《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以下简称《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⑱《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⑲傅汝勤，湖北籍，1906年自日本熊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当年10月得授医科举人，出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后任北洋督练公所医务股提调，天津官立医学院监督。

⑳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4页。郭秉璋：《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5—687页。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㉑《政府公报》1914年8月24日，第827号。龚纯先生认

为，1916年李学瀛校长辞职，改以全绍清继任，当误。龚纯：《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第184页。

㉒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4页。

㉓梁峻、曹丽娟：《清末医院概况》，《北京中医》2007年第8期。

㉔《各省游学汇志》，《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期。

㉕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83—284、265页。

㉖《保定·资遣军官出洋游历》，《大公报》1917年9月16日，第2张。

㉗张仲山：《军医学校之我见》，《军医杂志》1928年第1期。

㉘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5—266页。

㉙《陆军部呈大总统前派赴日留学之医科教官王连中等4员成绩优良拟请给予二等银色奖章文》(1921年5月26日)，《政府公报》1921年9月22日，第2004号。

㉚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5、263页。

㉛《军医学校移京》，《申报》1918年7月28日，第10版。

㉜《军医学生赴京期》，《大公报》1918年10月5日，第10版。

㉝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3页。张仲山回忆称，“民国七年秋，校址迁移北平新校”。张仲山：《军医学校之我见》，《军医杂志》1928年第1期。据该校二期生郭秉璋回忆：1918年，北京军医学校新校舍在“北京东城禄米仓”落成，建筑费用达30余万元，与陆军兽医学校、卫生材料厂毗连，校舍宏大，为当时北京少有新建筑。郭秉璋：《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7页。有研究者称，1915年，袁世凯将北洋军医学堂迁到北京，改称陆军军医学堂。高秋萍：《辛亥革命与中国医学的发展》，赵杰：《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8、330页。另说，陆军军医学校于“民国六年”迁入北京新址。孟威：《原国民党军政部陆军军医学堂概况》，《安顺文史资料》第8辑，1987年，第1页；冉懋雄：《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药科与药学季刊》，《中国药学杂志》1989年第8期。1914年8月有消息称，“陆军部附属之军医学校已由天津迁至北京，现正招考第二期学生，不日开学，其毕业之第一期学生已分派各师实习”。《北京电》，《时报》1914年8月11日，第3版。

㉞《陆军军医学校之内幕》，《东南日报》1922年1月21日，第6版。

㉟芦波：《军医学校药科简史》，《药学期刊》1943年第2—5期合刊，第105页。陈邦贤认为，陆军军医学堂于1915年迁入北京，常有二三百人在校学习。陈邦贤：《中国医学史》，

第229页。

⑧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6页。

⑨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09页。

⑩《陆军军医学校之内幕》,《东南日报》1922年1月21日,第6版。

⑪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4-355页。

⑫《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⑬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10-211页。

⑭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4页。

⑮有些史料编者或许对于该校普通科、本科和研究科的分设有误解,故在相应标点处略有欠妥处。“计算普通科、医科修业四学期,药科修业三学期,本科、医药科均一学期,研究科、医药科均半学期至一学期。”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5页。

⑯《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⑰《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83页。

⑱《军医学校开办研究科》,《中美日报》1921年2月20日第7版。有研究者称,研究科分设眼科、耳鼻咽喉科、军阵防疫科等3个,此说有误。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32页。

⑲《陆军军医学校招生广告》,《大公报》1912年8月23日,第1版。

⑳《本埠投考踊跃》,《大公报》1912年9月27日,第3版。

㉑《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4页。

㉒《陆军部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电》(1913年6月9日),《政府公报》1913年6月21日,第404号。

㉓《本埠军医招生》,《大公报》1913年6月22日,第3版。

㉔《都督府准陆军部电陆军军医学校医药两科续招新生牌示招考文》,《山东公报》1913年第161期。

㉕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上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该书编者称陆军部佳电为7月9日发出,实错。

㉖《熊希龄先生遗稿》第2辑,1396-1397页。《陆军部致武昌黎副总统等电》(1913年7月26日),《政府公报》1913年7月26日,第439号。

㉗《本埠传集新生》,《大公报》1913年9月16日,第4版。

㉘《陆军部致黎副总统等电》(1913年9月4日),《陆军部致江西、安徽、江苏、广东民政长电》(1913年9月4日),《政府

公报》1913年9月14日,第489号。

㉙《考取军医学生》,《大公报》1913年11月14日,第4版。

㉚《专电》,《时报》1913年11月12日,第3版。

㉛《陆军部通告陆军军兽医学校招生》,《申报》1914年6月17日,第1版。

㉜《段天槐致陆军总长段祺瑞函》(11月28日),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111-17。原件无年份,信中提及军医学校在天津,而学校在1916年冬迁入北京。且段祺瑞时为陆军总长。故推知当为1913年至1914年间。

㉝《陆军军医学校招生广告》,《申报》1916年7月7日,第1版。

㉞《陆军军医学校招生广告》,《申报》1917年8月21日,第1版。

㉟《陆军军医学校招生广告》,《申报》1918年9月7日,第2版。

㊱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7页。

㊲《陆军军医学校招生广告》(1919年7月),《政府公报》1919年7月27日,第1247号。《陆军军医学校招生广告》,《申报》1919年7月25日,第3版。

㊳《各省教育界噪声》,《申报》1924年8月6日,第11版。

㊴《陆军军医学校招生广告》,《申报》1925年7月22日,第2版。有研究者认为,1928年陆军军医学校药科学制改为4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实际上,至迟1925年已改。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㊵《陈辉辞军医校长,将由鲁景文继任》,《晨报》1928年2月19日,第7版。按沙林芳说法:“陆军军医学校每年暑假招收新生,医科招三四十人,药科二十人。”此说不确。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10页。

㊶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12页。

㊷《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㊸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10页。

㊹《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㊺《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㊻《陆军部呈陆军军医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请派员莅校监临以资观感文并批令》(1915年6月24日),《政府公报》1915年6月27日,第1126号。《陆军总长段芝贵呈大总统为陆军军医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请派员莅校赐训给章文》(1918年8月24日),《政府公报》1918年8月29日,第932号。

- ⑫《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139号。
- ⑬《校规从严》,《大公报》1914年1月13日,第4版。
- ⑭《革除示惩》,《大公报》1914年5月31日,第4版。
- ⑮《陆军部通告》,《政府公报》1917年3月14日,第664号。
- ⑯《陆军部通告》,《政府公报》1917年3月14日,第664号。
- ⑰《陆军部通告》,《政府公报》1919年11月11日,第1351号。
- ⑱《陆军总长段祺瑞饬陆军军医、兽医学校校长全绍清、蒋文熙令文》(1914年),《政府公报》1914年9月28日,第862号。
- ⑲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87-288页。
- ⑳《陆军部通告》,《政府公报》1920年4月14日,第1496号。
- ㉑《陆军部通告》,《政府公报》1920年7月24日,第1595号。
- ㉒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10-211页。
- ㉓《军医学堂将开展览会》,《北洋官报》1911年第2863期。
- ㉔《军医举行毕业》,《大公报》1915年7月1日,第5版。
- ㉕《军医学校药学科展览会广告》,《大公报》1915年7月4日,第4版。
- ㉖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4-265页。
- ㉗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5页。
- ㉘袁伟、张卓:《中国军校发展史》,第202-204页。
- ㉙《军医学生赴京》,《大公报》1918年12月2日,第6版。
- ㉚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31-132页。郭秉瑒:《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7页。
- ㉛《军医学校毕业考试,定于六月十日举行》,《社会日报》1925年5月21日,第4版。
- ㉜笔者曾依据《政府公报》所载陆军军医学校各时期毕业人数进行详细统计。有研究者认为,1911年,陆军军医学堂药科第一届学生18名毕业,当误。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第103页。还有研究者称,至1928年止,陆军军医学校共办13期,但未说明是医科还是药科,笔者均怀疑其可靠性。薛愚主编:《中国药学史》,第357页。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31页。“每年各有一期医科和药科的学员毕业”。此说不确。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11页。
- ㉝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31-132页。
- ㉞《陆军军医学校医院广告》,《大公报》1915年1月31日,第2版。
- ㉟《推广医院》,《大公报》1915年3月27日,第5版。
- ㊱郭秉瑒:《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7页。
- ㊲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第355页。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16年,第254页。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4页。
- ㊳郭秉瑒:《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6页。
- ㊴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5-267页。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31-132页。
- ㊵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16年,第254页。
- ㊶《解剖家之请领尸体》,《新华日报》1921年4月20日,第3版。
- ㊷《陆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开诊广告》(1919年2月12日),《政府公报》1919年2月12日,第1087号。《京闻》,《益世报》1919年2月12日,第6版。
- ㊸《陆军军医学校之内幕》,《东南日报》1922年1月21日,第6版。
- ㊹《军医学校成了旅馆》,《晨报》1922年4月12日,第7版。
- ㊺《政府公报》1922年7月1日,第2273号。
- ㊻《陆军军医学校施诊预告》,《益世报》(北京)1924年2月21日,第7版。
- ㊼《政府公报》1924年3月16日,第2868号。
- ㊽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31-132页。郭秉瑒:《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7页。
- ㊾《罢课声中之军医学校》,《新华日报》1921年4月7日,第3版。
- ㊿《军学界中之停滞,军官学校无开学之望,军医学校有停办之说》,《新社会报》1921年5月4日,第4版。
- ①《陆军军医学校火警》,《京报》1921年12月14日,第7版。
- ②《陆军军医学校之内幕》,《东南日报》1922年1月21日,第6版。
- ③《陆军部附属机关之不平鸣》,《大公报》1922年7月31日,第2张。
- ④郭秉瑒:《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卷下,第687页。
- ⑤《军医学校招生谈支撑支撑门面》,《京报》1922年8月6日,第7版。

⑩沙林芳:《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第210页。

⑪潘承祿:《曹锟和王承斌的关系点滴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66页。

⑫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洋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828页。

⑬《军医学校教员总辞职,因欠薪过多之故,学生请总统维持》,《晨报》1923年5月5日,第6版。

⑭《军事教育机关大举索薪》,《晨报》1923年6月13日,第6版。

⑮《军医校长辞职,学生议决挽留》,《晨报》1923年11月7日,第6版。

⑯《军医校长已复职》,《晨报》1923年11月28日,第6版。

⑰《军医学校校长易人》,《晨报》1924年1月28日,第6版。

⑱《英使为商人催款,军医校欠款》,《京报》1924年4月17日,第7版。

⑲《军医校举行毕业式》,《晨报》1924年7月17日,第7版。

⑳《政府公报》1924年11月21日,第3111号。

㉑《陆部迁往军医学校,只因参谋部挡驾》,《晨报》1924年

11月23日,第3版。《陆部迁入福佑门,军医学校仍回原处》,《社会日报》1925年3月25日,第4版。

㉒《政府公报》1926年4月2日,第3583号。

㉓《军医学校校长易人》,《晨报》1926年11月11日,第6版。

㉔《政府公报》1926年11月20日,第3808号。

㉕《后方医院成立,在东四六条军医学校内》,《益世报》(北京版)1927年10月13日,第7版;《后方医院成立在军医学校内》,《晨报》1927年10月13日,第7版。

㉖《陈辉辞军医校长,将由鲁景文继任》,《晨报》1928年2月19日,第7版。

㉗《政府公报》1928年2月24日,第4244号。

㉘龚纯:《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第185页。作者在列举校长名录时有误,“梁文志”应为“梁文忠”,“鲁京文”应为“鲁景文”。

㉙《陆军军医校新校长已抵平日内即可》,《新中华报》1929年2月15日,第6版。记者:《军医学校之近闻》,《军医杂志》1928年第1期。

㉚陆军部:《陆军行政纪要》,1920年,第269页。

Research on Army Medical School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Jianjun

Abstract: The Army Medical School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medical school establish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n founded in Tianjin in 1901, it wa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eiyang Military Medical Bureau. It was taken over by the Army Department in 1907 and soon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rmy Department took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faculty and their further study, and that of the progressive training of medical personnel. The school's enrollment policy was subject to slight adjustments, but it generally remained stable. Its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students was fairly strict,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those graduating from the school.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ffiliated hospital in 1915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its expan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served as a model for milit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providing service for the public. Lack of funds in the early 1920s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Army Medical School. This was the misfortune that 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not possibly avoid in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study of the tortuous experience of the Army Medical School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ght b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military education history.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eiyang Military Medical College; Army Medical School; military medicine; military education